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内涵及当代价值

王国欣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4日

摘要

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凸显, 如何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张力, 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议题。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 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社会生产方式与制度结构中加以考察, 为理解生态危机的本质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梳理其理论渊源, 继而系统阐释自然先在性、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物质变换理论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本质等核心内涵, 在此基础上从辩证思维、绿色转型路径与全球生态正义三个维度, 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于认识与应对当代生态问题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意涵。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当代价值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Yuanxin W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3,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4, 2026

Abstract

As global ecological crise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 to coordinate the tens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Ground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its methodology, the Marxist view of ecolog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production modes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hereby offering a distinctive analy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文章引用: 王国欣.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内涵及当代价值[J]. 哲学进展, 2026, 15(9): 120-125.

DOI: 10.12677/acpp.2026.159428

of ecological crises. This paper first trac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is view, then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its core connotations, including the priority of natur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humanity and nature, the theory of material metabolism, and the capitalist roots of ecological crises. On this basis, it proceeds to explore, from three dimensions-dialectical thinking, pathways of green transition, and global ecological justice-the theoretical explanatory power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Marxist view of ecology for comprehending and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issues.

Keywords

Marxist View of Ecology, Contemporary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与资源超载运行等生态危机已从未来预警演变为当代生存现实，对于正处于现代化关键阶段的中国而言，如何兼顾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应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超越了一般环境伦理的讨论，将生态危机置于社会生产方式与制度结构中考察，既承认自然的优先性与客观规律，又肯定人的实践主体性，为分析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因此，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内涵并探寻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溯源与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形成，既是对近代自然哲学成果的批判性继承，也是对工业革命初期资本扩张所造成的生态后果的深刻反思。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得以超越旧哲学的直观性与唯心主义的思辨性，建构起以实践为基础、以社会生产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2.1. 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批判性继承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在批判吸收近代自然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自然观问题上，德国古典哲学构成了最为直接的理论前史。黑格尔将自然视为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打破了机械论自然观的形而上学局限，但其将自然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外化，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将其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同时，费尔巴哈重新确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基本命题，强调人对自然的感性依赖，但其自然观是直观的而非实践的，看不到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能动维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双重扬弃，既避免了唯心主义对自然的虚无化，又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缺陷，为科学的生态观奠定了哲学根基。

2.2. 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早期暴露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 19 世纪，正值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推进时期。机器大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生产力增长，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破坏自然生态。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终日笼罩于煤烟之中，泰晤士河因工业与生活污水排放而浑浊不堪，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记录。资本主义农业同样暴露出严重生态后果，掠夺式耕作导致土地肥力持续下降，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将此概括为“对土地的掠夺”。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停留在对污染现象的道德谴责上，而是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入手，揭示了生态破坏的社会结构性根源，这一分析路径至今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

2.3. 全球生态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再次激活

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已从局部环境问题演变为系统性生存挑战，气候变化导致两极冰盖融化、极端天气频发，物种灭绝速率远超地质背景值，海洋酸化与塑料污染相互叠加形成复合风险。这些问题的全球性与不可逆性均非 19 世纪所能比拟，但生态危机内在的制度根源并未改变，资本积累对自然边界的突破冲动因全球化与技术升级而更加剧烈。“人类世”概念从地质学层面确认了人类活动主导地球系统运行，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揭示出并非所有人类负有同等责任，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工业化国家与跨国集团才是主要生态足迹制造者。重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绝非理论怀旧，而是回应时代生态命题的必然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 世纪中叶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系统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率先将生态议题与人的解放相勾连，批判技术理性对自然的工具化，提出了“自然的解放”[1]这一重要命题。其后，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自然的理由》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不仅面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面临生产力与生产条件(即自然)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将自然再生产提升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条件[2]。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则通过重读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系统论证了马克思本人即为生态学家，其“代谢裂缝”(metabolic rift)揭示了资本积累对地球物质循环的系统性破坏[3]。这些理论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注入了新的解释力，使其在当代生态论争中持续保持理论活力。

3.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实践的基础上研究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坚持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要在实践中真切地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生活关系的辩证统一。

3.1. 自然先在性

自然界在时间上先于人类而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明确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4]。恩格斯则将自然界界定为“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5]: p. 161)。这些论述揭示了自然构成了世界存在的根基，人类不能将其视为可以任意侵占和掠夺的对象。世界的物质性决定了自然的本源性，先有自然界的长期演化，才有人类的诞生，而人的意识不过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其内容归根到底来源于自然界。

从生态本体论的视角来看，自然可以区分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两个层面。前者指尚未被人类实践活动触及的自然本身，后者则是经过人的活动打上烙印、被赋予了价值和意义的自然。正是在人的实践中，自在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完全支配自然。人本身是自然长期演化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人的生存发展须臾不可分离，两者构成了相互依存、共生共在的生命共同体。因此，在任何发展实践中，都必须充分把握自然之于人的根基性意义，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体出发，秉持生态理性，尊重自然界的先在性与自在性，将人类活动始终限定在自然可承载的范围之内。

3.2.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6]，但这绝非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强调两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

质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本身就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并与之共同演化而来的[7]。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是自然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无一不来源于自然界的供给；工业生产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同样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支撑。一旦脱离自然界，人类的生命活动便无法延续，社会文明的进程也将被迫中断。除此之外，自然界还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源泉，壮丽的山川、多样的动植物不仅满足着人的审美需求，也激发着人的思维与创造力。

然而，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不排斥人的能动作用。人能够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实践，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8]，这正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显著特征。但马克思主义同时警示，人对自然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和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一旦人的活动超越了自然系统的自我调节限度，就会招致严重的生态后果。过度垦殖引发土地荒漠化，过度砍伐造成水土流失，这些事实反复证明征服自然的每一次所谓胜利，自然界都以自身的逻辑予以回应。因此，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既要求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更要求保持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

3.3. 物质变换理论

马克思将劳动界定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基本中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能量，经过生产与消费后又将废弃物返还自然，形成一种循环代谢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一正常的物质变换过程遭到了严重破坏。资本家受利润动机驱使，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与利用，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出现系统性断裂。这种断裂集中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城市的工业生产和人口高度集中，消耗了大量来自乡村的养分和资源，却无法将其返还土地，乡村的土地肥力因此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人与劳动产品、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也日趋加深，劳动者不仅与自然疏离，也与自身的类本质相背离。马克思深刻指出，物质变换的断裂不是偶然的技术失误，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要弥合这一断裂，单纯依靠技术改良或道德劝诫远远不够，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重新回到合理、可持续的轨道上来。这意味着生产的目的应从利润最大化转向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生产的组织方式也应当遵循自然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真正化解生态危机。

3.4.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导致了资本家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和贫富分化，也使得生态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往往会将工厂建在环境较差的地区，或者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随意排放，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广大无产阶级则由于生活贫困，无法享受到良好的生态环境。

然而，这一制度性诊断在当代学术场域中并非没有遭遇挑战。自由主义环境伦理学者如诺顿(Bryan Norton)等，质疑马克思主义将自然仅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未能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指责其为“弱人类中心主义”。对此，格伦德曼(Grundmann)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是关系性的，脱离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谈论“内在价值”既无认识论基础也无实践意义[9]。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 pp. 185-186)，表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一个逻辑一贯的理论整体。这些批判性对话不仅没有削弱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解释力，反而推动了其在回应多元挑战中不断自我丰富与理论重构。

4.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深刻揭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具解释力与建构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为认识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还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治理与制度建构提供了深层的价值基础。

4.1. 突破二元对立的辩证生态思维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认知层面提供了一种突破二元对立的辩证生态思维。当代生态哲学中长期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分歧，前者将人类价值置于最高位置，易滑向对自然的无节制支配，后者则强调自然的固有价值，却往往走向对人文关怀的消解。马克思主义既承认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离开了自然界人类无法生存和发展，又肯定人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的主体地位，这种“以人为本”而非“以人为中心”的辩证立场，有效突破了上述非此即彼的困境。同时，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进程中考察，指出人对自然的态度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前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关系模式，生态危机不是抽象的人类意识偏差，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一视角将生态哲学从纯粹的伦理思辨引向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批判性分析，为深层生态学、生态现象学等当代生态哲学流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历史维度，大大拓展了生态哲学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向。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问题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关联，避免了就生态论生态的狭隘视野，使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自然本身，而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与发展逻辑，这种整体性认知框架在生态环境议题日益复杂化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4.2. 指引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

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导向。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过程的基本性质，也揭示了资本逻辑如何造成这一代谢过程的断裂——城乡对立使土地养分无法循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使废弃物超出自然降解能力，这一分析对生产方式的转型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生产领域需要从“征服自然”的功利主义转向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价值取向，以循环经济替代线性经济模式，通过清洁生产技术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排放，将生态成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使经济发展与自然再生产相协调。同时，产业生态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改良，更涉及整个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包括产业链的生态化设计、园区循环化改造、绿色供应链管理 etc 系统性的实践探索。消费领域的变革同样可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汲取理论资源，物质变换理论表明消费并非独立于生产之外的个人行为，而是人与自然物质代谢过程的重要环节，消费方式直接决定着生产方式的生态走向。当代消费主义文化驱动下的过度消费、快速更新与大量废弃，构成了资源耗竭与垃圾危机的直接动因，因此需要在全社会倡导节约资源、循环利用、适度消费的可持续模式，使消费回归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功能，而非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需要公共政策引导、社会文化氛围营造与公民生态素养培育的共同推动。

4.3. 为全球生态正义奠定制度分析基础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将生态问题与制度问题内在关联起来，这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其必然无视自然再生产的客观周期，将自然要素仅仅视为无偿的索取对象与废弃物的排放场所。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生态危机的真正解决不能仅依靠技术改良或个体道德自觉，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性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将生态逻辑嵌入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包括生态红线的划定、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

环境成本的内部化、绿色发展的激励与惩戒机制等，使生态愿景获得刚性约束而非停留于空洞的道德呼吁。此外，制度保障还涉及生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生态法治的完善以及生态环境监管能力的提升，这些都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加以推进。在国际视野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还为理解全球环境正义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底色。生态正义不仅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公平，更关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代内公平——发达国家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了全球自然资源、排放了绝大多数温室气体，却将生态后果转嫁于发展中国家，而后者为了摆脱贫困往往不得不承受更为严峻的环境代价。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与阶级分析方法使这一结构性不公正得以显明，任何公正的全球生态治理方案都必须在承认历史责任差异与发展权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制度化的国际协商与合作机制，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秩序。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的行动指南，它既将生态问题置于社会生产方式中加以审视，又指明了通过变革不合理社会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根本方向。面对历经多重公共卫生冲击之后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冲突加剧资源争夺与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不确定性变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所蕴含的系统性思维与辩证方法愈发凸显其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生态危机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难题，任何碎片化的治理方案若不能触及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便难以从根本上化解危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仍是我们在不确定世界中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 [1]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2] O'Connor, J. (1998)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Guilford Press.
- [3] Foster, J.B. (2000)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 [4]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2.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8.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83.
- [9] Grundmann, R. (1991) *Marxism and Ecology*. Clarendon Press.